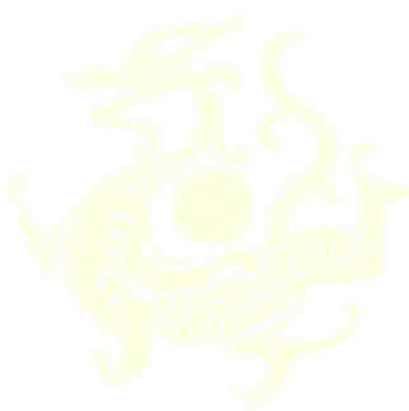


文心雕龙解析

(上)

周勋初 著



文心雕龙解析

(上)

周勋初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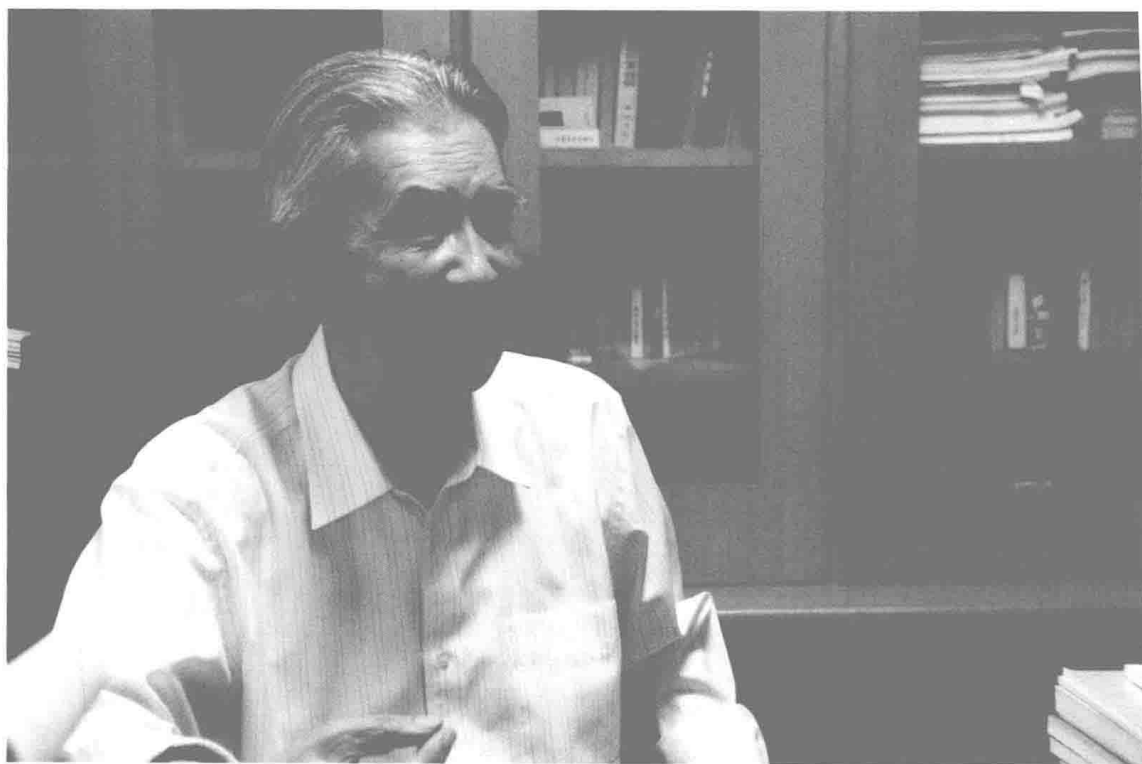
文心雕龙解析 / 周勋初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506-2211-1

I. ①文… II. ①周… III. ①文学理论—中国—南朝
时代②《文心雕龙》—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2322号

- | | |
|---------|---|
| 书 名 | 文心雕龙解析 |
| 著 者 | 周勋初 |
| 责 任 编 辑 | 郭馨馨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s.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东善桥秣周中路99号,邮编:211153 |
| 开 本 | 718×1005毫米 1/16 |
| 印 张 | 59.75 |
| 字 数 | 784千字 |
| 版 次 |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2211-1 |
| 定 价 | 280.00元(全二册)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57928003) |



周劭初

摄于2013年

时年84岁

前言

刘勰的生平

阅读《文心雕龙》，首先得对作者刘勰的历史有所了解。

刘勰的个人历史很简单，只有《梁书》的《文学传》中有记载，《南史》的《文学传》中也有同样的一篇传记，只是略有出入就是了。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空前繁荣，《文心雕龙》是古代唯一的一部体系完整的文论专著，这就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中国强调独立自主，从而着力宣扬传统文化，《文心雕龙》开始得到重视。八、九十年代，更是名家云集，著述繁富，其间产生了许多年表与年谱，对刘勰生平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反复的推敲。初学者读过正史中的传记之后，进一步阅读各家论述，或许会感到头绪纷繁，难于把握。牟世金撰《刘勰年谱汇考》，集合诸家之说，申述个人考辨所得，值得参考。^① 杨明照修订《梁书·刘勰传笺注》，又作了大量的考证，对刘勰的历史作了新的考察。^② 张少

① 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巴蜀书社 1988 年 1 月版。

② 首载《文学年报》第 7 期，1941 年；后经大幅改写，收入《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1959 年 1 月版；后经修改，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79 年第 1 辑；其后又作了大幅改写，载于《增订文心雕龙校注》本，中华书局 2000 年 8 月版。今即据《校注》本。

康继起,拟订了一份简表,吸收了台湾学者的一些成果,加上自己的精密论证,又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①读者如欲了解刘勰的生平大事,可以参看张少康的这一新表。

上述几家的考证,对于恢复刘勰的历史原貌作出了贡献,但还不能说已可成为定论。因为有关刘勰生平的历史记载材料太少了,各家论证时,势必要有很多假设和推论,这就不可避免地会留下一些不确定因素。

李庆甲作《刘勰卒年考》和《再谈刘勰的卒年问题》,引用了几位宋元时期僧人撰写的佛教历史典籍,中有关于刘勰出家年代的记载;他还依据正史合传以传主卒年为序的惯例作出推断,又把刘勰的出家与萧统之歿联系起来,把刘勰之死定在中大通四年(532),这就把过去许多学者所定的年代延后了很多年。^②李庆甲在刘勰生平研究问题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杨笈、张表就是在此基础上续作论证的。但是这种新说也有其根本的缺憾,因为僧徒的历史著作一般都不遵循中国史官的传统规范,常是为了扩大佛家影响而编造史实。中国正史的著述首重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重要人物的事迹,文学方面的记载常嫌简略,著述态度也每嫌不够严谨,因此纯依《梁书·文学传》中人物的先后顺序考刘勰生平,也非绝对可靠。上述佛教历史典籍的产生年代上距齐梁已有五六百年之久,其中对萧统与刘勰的相关记载更是纷纭不一,遽难令人信从。穆克宏曾引其中的首出之作南宋释祖琇《兴隆佛教编年通论》之说,申论之曰:“这里,把昭明太子萧统的卒年定于大同三年,显然是错的。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这段记载是先述萧统去世,然后旁及东宫通事舍人刘勰,并不是刘勰的变服出家是在萧统卒后。

① 张少康《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见第一章《刘勰的家世、生平和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

② 二文载《文心雕龙识隅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有的研究者对这段记载的误解,引起了许多讨论,实难以令人信服。再说,这段记载只是在《梁书·刘勰传》的基础上编写成的,编者并没有掌握任何新的资料,怎么能够提供刘勰卒年的新证据呢?没有新证据,又怎么能够得出新的结论呢?因此,关于刘勰的卒年,我仍然采用范文澜同志的说法。”^①这种谨慎的态度,在《文心雕龙》研究者中也有其代表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研究历史人物时,首先关注其出身,因此刘勰到底出身于庶族还是士族,是低级士族还是高级士族,有人进行了探讨。^②随着历史学界对此深入研究,问题趋于明朗。^③《梁书》本传上说:“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说明刘勰出身于官宦之家。而据《宋书·刘秀之传》上的记载,他是刘宋开国君主刘裕最为倚重的大臣刘穆之的从兄之子,可以认为刘勰出身于一个显贵家族。有的研究者则注意到,《南史》上已把“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一句删去了。何以如此,情况确是很复杂,值得进一步探讨。或许刘勰一系为了抬高自家声价,与刘秀之一族硬拉上关系。六朝之时常见这种族谱作假之事。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江苏镇江地区句容县发现了一方刘岱墓志,上面记载着刘氏的先世,与灵真情况相同,可证《宋书》上的记载是可信

① 穆克宏《刘勰生平述略》,原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还附入其所撰《刘勰年谱》;此文后又收入论文集《文心雕龙研究》中,鹭江出版社2002年8月版。

② 参看周振甫主编《文心雕龙辞典》中“各家争论说介绍”内“刘勰家世”部分,中华书局1996年8月版;张少康等著《文心雕龙研究史》第四章《当代的〈文心雕龙〉研究(下)》“关于刘勰的身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

③ 唐长孺对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结构有很深入的分析,可参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的前面部分。他在《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的《读史札记》中对“素族”、“寒士”的分析,亦可参看。二书分列《唐长孺文集》第四卷、第二卷,中华书局2011年4月版。

的。刘勰应当出身于刘穆之、秀之等同一家族。五胡之乱，东莞刘氏由徐州东莞郡莒县（今山东莒县）迁至南方侨置的南徐州东莞郡治所京口（今江苏镇江），虽非最高层阶的士族，却也高官多见，属于层次稍低的士族。只是他与家族中人的关系似乎并不亲密，父亲又早歿，因无人援助，也就陷于窘迫了。

《梁书》上说他“家贫不婚娶”，何以如此，大家看法也不一致。有人认为士庶天隔，他家穷了，同一阶层中人不肯把女儿许配给他，又不好到其他阶层中去物色，只能陷于“不婚娶”的困境。有人则认为他已皈依佛教，故而不婚。这种事情很难说清楚。今日人们对这类问题作出的分析，大都是基于个人对当时社会的理解，认为情理上必然如此而作出的判断。但人在社会上存身，情况至为复杂，要想根据历史上的个别材料进行分析得出大家普遍认可的结论，很难。我们只能说，刘勰因父亲早死，家道中落，在婚姻问题上高不成低不就，也就难以解决。况且他在二十多岁时即已入居定林寺，置身宗教场所，周围全是“不婚娶”之人，也就会淡然置之了。

看来刘勰思想上一直存在着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他对佛教的信仰，可谓始终如一。除《文心雕龙》一书外，他还留下了《灭惑论》与《剡山石城寺造像碑》二文。^① 据近人考证，《灭惑论》的写作当在齐代，是为批判道教中人提出的《三破论》而写作的。所谓“三破”，即“入国而破国”，“人家而破家”，“人身而破身”。僧徒剃掉父母生下的毛发，又不营家室，违背中国传统，因此《三破论》中攻击佛教

^① 《灭惑论》载梁释僧祐编《弘明集》卷八，《四部丛刊》本。《剡山石城寺造像碑》全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载宋孔延之编《会稽掇英总集》卷十六，杨明照从清道光六年山阴杜氏刊本抉出，首载于《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1月版。此碑残文见《艺文类聚》卷七六，题作《剡县石城寺弥勒石像碑铭》。

徒的不婚娶有“绝种之罪”。刘勰以为佛教的戒令自有其理由：“妻者爱累，发者形饰，爱累伤神，形饰乖道，所以澄神灭爱，修道弃饰。”由此可见，刘勰对佛家教理也是信从的。他入定林寺后，一方面撰写《文心雕龙》，奉儒家思想为正宗，评判古今文章得失；一方面宣扬佛教教理，维护佛家宗旨。他在进入梁代王室系统的文士队伍之后，一直坚持二者并重的立场，只是随着处境与评论对象的不同各有侧重罢了。例如他在写作《文心雕龙》和在朝廷任职时，儒家思想自然上升至主导地位，而在写作《灭惑论》和各种有关佛教的碑志时，也就纯以信徒的身份出现了。

看来刘勰的家世对他深有影响。其上代均重建功立业，父亲早歿，未能升至要位，然位列四品，已经显示前途有望，说不定日后也能像刘穆之、刘秀之那样光耀史册。这种家族中的子弟，常是不甘沉沦而欲有所作为。《文心雕龙·程器》篇中说：“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弼中，散采以彪外，梗楠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这一番话，当是他本人有感而发的自白。他既不甘于“独善以垂文”，希望能有“奉时以骋绩”的机遇，从他进入萧氏王室之后的经历来看，也曾作出过努力，然而并不如愿。

《梁书》本传上说：“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后“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这些任命中的记室之职，担任的是秘书一类职务，应是看重他善于文学的缘故。王室僚属中的秘书类官员每兼领军中职务，向军幕中的要职发展，刘勰担任的车骑仓曹参军、步兵校尉等职，与其上代担任的军中职务类同，但他未能由此“负重”而“任栋梁”，最后还是只能“独善以垂文”而命世。

看来萧氏一门都很看重刘勰的文才。上一代人，临川王萧宏引为记室，建安王萧伟请他为佛寺撰写碑文。下一代人，南康王萧

绩又引之为记室，昭明太子萧统则让他到东宫兼职，且历时颇久，“深爱接之”，而从传世文献来看，湘东王萧绎对他也很欣赏，《金楼子·立言》篇曰：

管仲有言：“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然则声不假翼，其飞甚易；情不待根，其固非难。”以之垂文，可不慎欤！古来文士，异世争驱，而虑动难固，鲜无瑕病。陈思之文，群才之隽也。《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可拟于昆虫，施之尊极，不其嗤乎？^①

这一段话，引自《文心雕龙·指瑕》，说明萧统兄弟都很重视刘勰的文学见解，萧纲、萧绎的文字中都有暗合《文心》的地方。

不过刘勰思想中的宗教成分还是太浓烈了。他在《文心雕龙》中尽力避免佛家教义的闯入，将之定格为宣扬儒家宗旨的一部学术著作，亦即“入道见志”的一部子书，但他在《论说》篇中纵论当前学界纷争时，也就提出“般若”之说压倒“有、无”之辨了。这也说明，刘勰即使是在宣扬儒家义理时，还是不能忘情于佛理的宣扬。

因此，一当梁武帝萧衍于天监十六年诏令七庙飨祭改用蔬果之后，刘勰随即上表陈请二郊的祭礼应与宗庙一致，改用蔬果，取代牺牲。此举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于此也可看到刘勰笃信佛家教义的态度前后一致，而这与萧氏王室中人的儒释相容的作风也一致。

正由于这种思路上的一致，刘勰常是来回于王室与寺院之间。天监七八年间，他受王家之命，返回定林寺，担任佛经方面的整理

^① 参看许逸民《金楼子校笺》卷四《立言篇第九下》，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

工作。梁武帝“选才学道俗释僧智、僧晃、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经论，以类相从，凡八十（八）卷”。^①一当僧祐去世，梁武帝萧衍又立即想到让刘勰回到定林寺去完成经藏编目的任务去了。

僧祐在萧氏皇室中享有至为崇高的声誉。梁武帝经常请他到宫中讲经，遇到佛学上的问题，佛事方面的处理，都要听取他的意见。僧祐晚年，患脚疾，行动不便，梁武帝让他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嫔妃受戒。临川王萧宏，平南王萧伟、永康定公主均尽师资之礼。刘勰进入萧梁皇室文士队伍，得到上、下两代的接纳，应当与僧祐的引见有关。即以前时封为建安王的萧伟来说，分封的境内剡县发现了灵异之事，上报之后，朝廷随即命僧祐营造大佛，且由刘勰撰写碑文，即可见其因缘。萧统之母丁贵嫔亦崇信佛教，师奉僧祐，刘勰受到昭明太子的爱接，亦当与这层因缘有关。^②

刘勰重回定林寺，宗教方面的情绪越发强烈，证功已毕，遂“燔鬓发以自誓”，“启求出家”，可知其时他为宗教热忱所驱使，已陷狂热状态，于是他在人生的起点定林寺中以一名僧人的身份渡过了晚年。

刘勰研究基本史料之分析

我对刘勰的生平作了概括性的介绍，便于读者对此先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而不致多歧亡羊，无所适从。只是想要了解得深入，则还得作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得对《梁书》和《南史》的性质作些介绍。

① 见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五《梁扬州庄严寺沙门释僧旻传》，大正新修《大藏经》本，第五十册，史传部二。

② 参看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一《齐京师建初寺释僧祐》，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本，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

大家知道,《南史》是抄录宋、齐、梁、陈几朝史书而成的,又进行了大幅度的删节,增加了许多新的史料。从删节而言,或是认为无关紧要,或者只是为了减少篇幅。在刘勰传中删去有关刘秀之的记载,当是以为此事无妨大局,而他没有在刘勰传中增加一丝新的材料,却是耐人寻味。

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自云,他“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馀卷,皆以编入”,说明他曾在南朝的四种正史记载之外,补入了大量史料。从我们研究文史的人来说,《南史》中增入的“杂史”,很多属于笔记小说中的记载,尤应重视,因为其中常有涵义丰富的一些奇闻轶事。例如《江淹传》中,就记有他梦见张协向他索回一匹锦与郭璞向他索回五色笔之事,这些都是传颂千古的文坛嘉话,而“江郎才尽”这一典故,也一直为后人所惯用。

《梁书·五王列传》中,记叙王室中人的事迹多避忌,不能窥知究竟。《南史·梁宗室列传》上、下中则补入了很多珍贵的材料,可以说明刘勰出仕之后的那些事主为何等人物,从而可以逆探其时的处境。

《南史·昭明太子统传》中还记载,萧统葬母时为了风水方面的原因,埋蜡鹅厌禱而失欢于父,终至惭愤而卒。这事与刘勰晚年的去向也有关系,却不见于《梁书》中的记载。可知《南史》中所增补的史料,确是值得后人高度重视。

这就说明,研治魏晋南北朝文史的人,如将南朝几部正史与《南史》并读,自可从中得到启悟。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有《南史增删梁书处》一条,曰:

《南史》增《梁书》事迹最多。李延寿专以博采见长,正史所有文词必删汰之,事迹必櫟括之,以归简净,而于正史所无者,凡琐言碎事,新奇可喜之迹,无不补缀入卷。而《梁书》本据国史旧

文,有关系则书,无关系则不书,即有关系而其中不无忌讳,亦即隐而不书,故行墨最简,遂觉《南史》所增益多也。^①

吕思勉在介绍齐代萧子良之败时,以王融之死为例,纵论《南史》等书之史例,文曰:

《十七史商榷》曰:“融乃处分至无不从命一段,《齐书》所无,《南史》所添也。描摹情事,颇觉如绘。但李延寿既知此,则下文西昌侯固争不得一句,亦《齐书》所无,延寿何意又添此一句乎?”案此可见古人史例,凡众说皆网罗之,虽相矛盾,亦不刊落,只待读者之自参。因当时行文通例如此,故不必更加解释。后人动以矛盾驳杂议古人,实非也。^②

由此可见,李延寿编纂《南史》时广采异说,即使内容矛盾的材料也尽行纳入,而他所作的删节,却有不尽妥当之处。除赵翼外,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均曾多次指责其学识方面之不足,这些亦应引起后人注意。《南史》中对刘勰史实的处理,也是在不该删节之处作了删节,大家期待他有所加入时却没有任何增添。不过这事也可说明,其时有关刘勰的记录确实很少,即使喜奇好异如李延寿辈,也无法求得任何一点新的史料。

这里可对记录南朝历史的另一史书作些考察。唐肃宗时史家许嵩撰《建康实录》,对齐、梁之时的历代帝王及其臣僚均有记载,有些地方还有可补正史之处,然无一字提及刘勰。书中对建康都城之内的寺宇也有记叙,仍无有关刘勰的任何记载。^③

① 参看《廿二史札记》卷十《南史增删梁书处》、《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卷十一《南史增梁书琐言碎语》等条,王树民校证本,中华书局1984年1月版。

② 吕思勉《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十章《齐梁兴亡》第四节《齐治盛衰》,开明书店1948年10月版。

③ 参看孟昭庚、孙述圻、伍贻业点校《建康实录》,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专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吾等还可注意的是，时人诗文中，均无有关刘勰的丝毫踪迹，可知他在文坛上虽有一时名望，却是很少有人与他交往。传世的典籍中，不见任何记载，只有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集杂记铭目录序第十》中录有刘勰撰的《钟山定林寺碑铭》一卷，《建初寺初创碑铭》一卷，《僧柔法师碑铭》一卷；^①梁代慧皎《高僧传》卷八《齐上定林寺释僧柔》、卷十一《齐京师建初寺释僧祐》、卷十二《齐上定林寺超辩》三人的传记中有“东莞刘勰制文”的记载，可与《梁书》上说的“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之说相印证。

种种事实说明，刘勰之于梁代文坛，当属落落寡合者。或许他的为人宗教色彩太浓，因而不易与大家融合吧。他在政务官上的经历，也就是做过“太末令”，但也未能由此步步升迁，展示其政治上的抱负。看来这也是因为他不太能适应官场的一套，因而只能博得一个“政有清迹”的结果。

这里可以附带一提的是，即使其时他在地为官作宦，还是未营家室，或许仍是“妻者爱累”的思想在起作用吧。

刘勰为文长于佛理，对南朝文士擅长的吟风弄月，看来并不相合，这也使得他只能以“深得文理”见长，从而博得性格淳静而作风相合的昭明太子萧统的欣赏。

正像《文心雕龙》中所再三强调的，自刘宋之后，文学在向轻艳的方向发展。南朝本是一个处在急剧转型中的社会，风气越来越趋于浮靡，举目文坛，可谓滔滔者皆是。即使是老一辈的梁武帝，皈依佛教，然对江南民歌与古代情诗有偏好，留下了不少旖旎多情的诗歌与乐府。好古体的裴子野，和昭明太子关系深切的刘孝绰，也有言情之作采入《玉台新咏》之中。这些都与刘勰的情况大有差

^① 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苏晋仁、萧炼子点校本，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版。

异，史料中从无刘勰与其他文士酬唱的踪迹。

总的看来，刘勰始终游离于齐梁这一阶段创作界的主流之外，因而没有留下任何诗文作品。即使在类书中，也不见有任何残文佚句。他的文章当然写得很好，《文心雕龙》就是以漂亮的骈文写成的，但在竞相创作流连哀思之作的文学界却没有留下踪影，看来这与他热衷于理论探讨，坚守儒家基本立场有关。浓厚的宗教背景，让他不能融合到文人队伍中去，但他的思辨能力，不但在佛学界博得了尊重，还得到了文人队伍中人的普遍认可，也博得萧氏王室中人的赞誉。

萧宏的愚妄贪顽，萧绩其时年岁尚小，不可能支持刘勰的发展，双方的思想作风差距太大。其间幸得好文学的昭明太子萧统的赏识，“深爱接之”，才能使他的文才在世俗社会中有所呈现。^①

《梁书》本传上说：“（《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使命取读，大重之。”按照清儒刘毓崧的考证，《文心雕龙》成于齐代。^② 沈约之“贵盛”，当在辅助梁武帝萧衍篡齐之后。因此刘勰献书沈约，当在梁初。刘勰前得文坛领袖沈约的发现，后得高层知音萧统的赏识，这应当是他在文学道路上最舒心的两件大事了。

刘勰的成长，始终与定林寺的主持僧祐有关。僧祐去世不久，梁武帝就想起刘勰，命令他重返这一宗教圣地，继续整理佛教典籍，编纂佛经目录，完成僧祐的心愿。值得注意的是，一代高僧僧

① 参看曹道衡、傅刚《萧统评传》上篇《萧统的家世和生平》第四章《梁武帝诸弟侄及梁武帝对他们的态度》、第六章《萧统诸弟及萧统与他们的关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版。

② 刘毓崧《书文心雕龙后》，载《通义堂文集》卷十四，南林刘氏求恕斋 1920 年刊本。

祐的碑文也是由刘勰撰写的,可见他落发前后在佛学界的地位之崇高。

刘勰思想的时代特点

刘勰的思想,今人可能难以理解。他在《文心雕龙》中那么热情地宣扬儒家的宗旨,为什么还不能忘情于佛家的义理?这就得从南朝思想家的常见情况讲起。

《梁书·武帝纪下》叙萧衍生平,曰:“少而笃学,洞达儒玄。”《南史·隐逸下·陶弘景传》上说:“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这里是说梁武帝时玄风大盛,朝野风靡。颜之推身遭梁末亡国之痛,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极言玄谈之弊,云是“直取其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务之要也。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梁书·儒林·太史叔明传》:“少善《庄》、《老》,兼治《孝经》、《礼记》,其三玄尤精解,当世冠绝。”刘勰正生活在这一段玄风日炽之时。他笔下所透露的复杂情况,可以帮助后人看清这一时期的社会动态,说明很多疑难问题。吾等自可从文史方面的多种不同角度进行解读。

汉末魏初,玄风开始形成。其时经过汉末数十年的动乱,此前的社会秩序已经难以维持,于是何晏、王弼等人引入道家之说,以此改造儒家思想。何晏作《论语集解》,徵引汉代经师的成说,时而掺入老庄之学阐述孔门义理。王弼注《易》,更将儒道两家进一步融合,玄学的面貌开始清晰。《三国志·钟会传》附《王弼传》上说他“好论儒道”,而又尊孔子为圣人,说明玄学初起之时,仍尊儒家,把孔子放在首尊之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表现,有类于此。

时至齐梁,玄学仍在不断扩大其影响。尽管从其内在的义理而言,已无多大发展,但是融合儒、佛的程度却更为深广,在多种学术领域内均可发现其踪迹。锺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山

水诗的写作及其理论方面的总结，均可看到玄学在各种论题上的渗透。

南朝思想界也一直处在急速的转型之中。早期的一些士人崇奉儒学而又兼奉道释，他们的特殊作风，在一般人看来，有些感到怪异。时异势转，人们展示风貌的方式随之改变，一些惊世骇俗的作风，稍后些时，大家也会视为平常了。

史书上留下不少这方面的记叙。

《南齐书·张融传》载其临终遗令曰：“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

《南齐书·周顒传》曰：“……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日不解。”孔稚圭《北山移文》上称他“既文既博，亦玄亦史。……谈空空于释部，核玄玄于道流”。可见其作风与张融一致。

《南史·儒林·皇侃传》曰：“尤明《三礼》、《孝经》、《论语》。……侃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所撰《论语义》、《礼记义》，见重于世，学者传焉。”

《梁书·处士·何胤传》：“既长好学，师事沛国刘瓛，受《易》及《礼记》、《毛诗》，又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其业皆通。而纵情诞节，时人未之知也，唯瓛及汝南周顒深器之。”

《陈书·儒林·张讥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吴郡陆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休，至真观道士姚綏，皆传其业。”

《南史·隐逸下·马枢传》：“六岁，能诵《孝经》、《论语》、《老子》。及长，博极经史，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素闻其名，引为学士。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欲极观优劣，乃谓众曰：‘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于是数